

大理论的复归

昆廷·斯金纳编

栽深藥圃藥樹吐藥頭非世栽深藥圃

栽深藥圃藥樹吐藥頭非世栽深藥圃

编者序

摇摇作为本书的编者,我首先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谈话部的迈克·梅森。他最早同我讨论组织关于人文科学最近在理论上的发展文章。因此,本书中有八章本来都是为他给第三台制作的关于上述主题的系列谈话所撰。这组广播谈话的总标题是“大理论的复归”,其后这些谈话又都发表在《听众》上。梅森先生说服英国广播公司采用这组谈话,促使我与各位作者联系,还向我和所有参加广播的人提供了关于题目范围和表达我们观点的最佳方式等方面的精辟建议。我深为感谢。摇摇

我也十分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杰罗米·梅诺特。他的指导和鼓励使广播稿变成了这本书。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修改并大大扩充了原广播稿,增加了书目和阅读指南,还增加了两个新章节:戴维·霍伊的“德里达”和詹姆斯·布恩的“列维—斯特劳斯”。乔纳森·辛克莱—威尔逊以其特有的冷静和高效率完成了本书出版过程中的编辑工作。宾妮·索斯特校对全稿,并精心解决了最后阶段的一些困难。

我还想在此向本书的各位撰稿人致谢。他们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为我提供关于文章范围的宝贵建议,热情并按期交稿。最后,我还要感谢在写作和修改我的“前言”时帮助我的人们:他们包括就原广播写信给《听众》的听众,但愿我已经吸取了他们的批评;安东尼·吉顿斯

（大噪书增图）和苏珊·詹姆斯（陈其华译）他们二位极为细致地评审了“前言”各稿，并在全书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建议。

昆廷·斯金纳

目摇录摇

导论	昆廷·斯金纳摇员
伽达默尔	威廉·奥斯维特摇圆
德里达	戴维·霍伊摇猿
福柯	马克·菲尔普摇源
库恩	巴里·巴恩斯摇愿
罗尔斯	阿兰·莱恩摇怨
哈贝马斯	安东尼·吉顿斯摇员远
阿尔杜塞	苏珊·詹姆斯摇员猿
列维—斯特劳斯	詹姆斯·布恩摇员圆
年鉴派历史学家	斯图亚特·克拉克摇员怨
在理论的大厦里	弗里德里克·克鲁斯摇员圆
参考书目	摇圆圆

导论

昆廷·斯金纳

—

整整二十五年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论及英语世界人文科学的现状时,专门提出两种主要的理论传统加以痛斥。他认为它们有碍于他在自己的书名中所称的“社会想像力”^①的有效发展。这两种传统之一是通过操纵史实来炮制“超历史的紧身衣”的倾向——他把这种传统特别同孔德、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但另一种对人文科学的发展阻碍更大的传统,他称作大理论,意即相信社会学科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努力建立“关于‘人类和社会本质’的系统理论”。

同书,费

赖特·米尔斯以想像力而不是科学的名义攻击大理论^②,

① 赖特·米尔斯在攻击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同时,还指示了他痛恨的第三种倾向:有些社会科学研究堕落到只研究“一系列互不相关而且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事例。”同书,费

② 这一点使他很可贵地不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理论家。他是这些理论家最早的批评者之一。

这在他那一代社会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但他对建立关于人类本质和行为的抽象、规范性理论的敌视,则是与当时英语世界中不仅社会学,而且包括所有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领袖人物一致的。举例来说,历史学家也表达了许多相同的疑虑。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我谈到的这个时期,刘易斯·纳米尔爵士 (Lewis Namier) 是公认的英国主要历史学家,因为他不仅津津有味地记载政治权力中心的各个政治角色的具体活动,而且对相信普遍的社会理论 (他更乐于称之为信口雌黄) 会有益于解释政治行为或社会变革过程的人极尽嘲讽之能事。 (Namier 1955: 10)

甚至在同代的伦理和政治家中我们也会碰到对大理论的同样的怀疑,其表现是两种获得广泛支持的相互关联的论点。其中一种,借用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的著名书名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到来。 (Bell 1969) 试图系统阐述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人仅仅被看作是糊涂的跟不上科学时代发展的老派人物。与此相关,实证主义认为只有抛弃过时了的混淆客观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大理论研究,才能完成建立真正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实证理论”的任务。^① 这一切使得两千年来关于社会的哲学思考看上去似乎就要突然终止了。^②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哲学同其他文化学科间的恰当关系的观点,也助长了建立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努力。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被看作是通过对用以表达它们的词汇的意义进行分析来阐述普遍观念。这种观点的一种言外之意是以为伦理、社会和政

① 这种方法的典型,尤其是应用于民主国家的政治研究方面,请见 (Hempel 1965) 对这种方法最有名的批判,见 (Hempel 1965: 10)

② 见 (Hempel 1965: 10): “至少从现在看来政治哲学已经寿终正寝了。”

治哲学的真正任务可以是为我们提供某种理想和行为的理性辩护的想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举五十年代另外两种代表著作为例,哲学的目的被看作不是研究伦理本身,而是研究 [海尔 (Hail) 和威尔登 (Walden) 的书名所说的] “伦理的语言”;不是政治本身而仅仅是 [威尔登 (Walden) 的书名所说的] “政治的词汇” (Walden)。连哲学家自己都宣称在当时具体的伦理和政治问题上,他们没有什么系统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一种关于社会的纯经验式的科学注定要产生了。

同时期某些主要哲学原理甚至教条也进一步支持了对科学的渴望。在科学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什么叫解释的实证主义阐述。人们相信,只要显示可以从已知自然,至少统计规律中推论,进而预见到某些令人不解的现象的出现就算是对它们作了解释。^① 这种分析的盛行不仅使社会科学家把规律看作解释社会现象时唯一可接受的基础,而且要求他们相信在原则上没有理由不能把人类行为同自然事件一样观察、分析。^② 结果,“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借用艾尔 (Aylmer) 著名文章的标题——成了社会学科不仅是而且可能是唯一可接受的目标。 (Aylmer 范远·图原)

最后,巴里·巴恩斯所描述的 (见本书第五篇),对科学实践本身的“理性主义” (Barnes) 设想也给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想法提供了确切的指导和一般鼓励。在基本持“理性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中,卡尔·波普 (Popper) 及其为数众多的弟子或许对社会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最有力的影响。波普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什么是有科学根据的理论的观点,并使

①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论点请见 与 (Aylmer) 范远·图原 同书 图原·源页指出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阐释历史现象。

② 对这个观点最典型的陈述见 月 (Aylmer) 范远·图原

之广为流行。波普认为：假如，而且只有当理论接受并通过了旨在证伪的“决定性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也是科学的。如果一个论点——或某个理论中的一些论点——通不过或被证明无法承受证伪试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不过是无稽之谈。由此，社会学科就有了区分基本有事实依据的和仅仅是规范性或形而上的论断的现成而又简便的途径，从而使自己走上通向真正科学的笔直而又狭隘的道路。波普本人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辩论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极力主张这个区别的重要性。在人文学科中只有零碎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才是值得称道，而所有乌托邦社会哲学则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时过境迁。过去的一代人又开始实践并鼓吹乌托邦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重焕青春并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形式；拉康及其追随者又赋予精神分析新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继续反映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相似之处；女权运动带来了一系列以往为人忽视的洞识和论点；在纷纷攘攘之中，英语世界社会哲学界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堡垒不断受到阐释学者，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入侵思潮一浪接着一浪的威胁和侵蚀。

现在，战斗的尘埃渐渐落定，似乎已经可以对结果加以评判了。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打算做的。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位我们认为对改变理论信念起了重大作用的思想家。但我们同时又努力把他們置于更为广泛的知识背景之中，目的是阐明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重构人文学科的动荡和变革具有哪些更为普遍的特点。^①

① 关于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建问题请见

二

这些普遍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以为自然科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关的模式的设想的广泛反抗。日益增长的怀疑最明显的反映是这一种启示的再生：解释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是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的活动，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演绎模式——这一实证主义观点一定是根本错误的。从许多不同方向都传来了建立人文学科研究阐释学方法的呼吁。它将能真正体现这样一种主张：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必须包括——或许恰恰就是——从活动执行者的立场来重现并解释社会活动的意义。

近来一些社会理论家试图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调和这两个传统。他们声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都必须兼顾这些现象的意义和起因。^①但其他理论家不相信这种调和是可能的。他们反而转向了另一种激进得多的观点——前辈学者狄尔泰和柯林伍德的观点——即：我们应以纯解释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②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对这些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实证主义相反，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坚持言辞的意义取决于其使用，因而若要理解任何有意义的事件——不论是行动还是言辞——我们都要置之于恰当的“生存形式”

① 哈贝马斯坚持这种立场，一方面反对伽达默尔，一方面反对实证主义者。见英国社会理论家伦西曼在《》中赞扬韦伯采用这种立场，并在《》中探讨了它的含义。

② 关于对这两位学者兴趣的再现，可见《》（论狄尔泰），《》（论柯林伍德）再次论述了类似情况。

法理学的范畴之中。^① 不过,同人文学科研究更直接相关的则是本书第二篇将要讨论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对类似观点的采纳。伽达默尔在其主要论著《真理与方法》中引用狄尔泰,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证明在寻求对社会活动的理解时应该采用的是解释文本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追寻起因或建立规律,而完全是寻求通过局部来理解整体,并通过它们对整体意义的贡献来理解局部的环形过程。

不过,伽达默尔同时也给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注入了新的怀疑主义成分。通过强调我们视野的局限性,我们在试图理解另一种生命形式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偏见和成见,伽达默尔给我们是否能够达到解释的传统目标:以其原来的含义客观地理解不同的行动、言辞或文本,打上了问号。他的结论是:我们能够指望得到的最多是“各种视野的融洽”,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的现存世界同我们试图评价的不同世界的部分协调。

无秩序主义认为我们根本不该把解释看作获取真理的方法,而应该把他看作费耶拉班德书名所称的“反方法”。伽达默尔的怀疑同这种无秩序主义结论仅一步之隔。费耶拉班德把这一观点主要运用于科学理论。他指出我们应该不受拘束地,充满想象地幻想出新的理论来替代现存的所谓知识。“然而,更加令人不知所措的是在许多领域里,甚至在文学作品的阐

^① 辛兹格,特别是页愿。关于这个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中心地位请见 关于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见 辛兹格。

^② “只有一条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坚持的。这条原则是:任何东西都不绝对”。通过对历史事例的研究证明无秩序主义方法的优点。

释中都有人拒绝把再现作者原意看作是阐释者的任务，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方面主要的反传统人物是本书第三篇讨论的对象雅克·德里达（~~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乐于指出这样的例证：语义上的含混不清加上缺乏能够告诉我们如何理解的上下文（~~语义上的含混不清~~），可以造成根本无法阐释的言辞（~~根本无法阐释~~）。随后他把这一观察结果普遍应用整个文本（~~整个文本~~）和著作（~~著作~~），进而强调指出，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突出任何一种阐释。他的结论是：阐释工作实际上是个错误，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借用他最近一本书的书名）“意义的分解”（~~意义的分解~~），即以越来越多的例证说明文本的最终不可读性。（~~不可读性~~）

三

随着对于把社会学科建筑于传统自然科学模式之上的可能性和哲学怀疑日益增加，近年来也有人从伦理上反对建立关于社会和科学的实证主义愿望。最先遭到这一新发展攻击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麦金泰尔（~~麦金泰尔~~）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论点本身不过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舆论一律的政治现状。这种解释把沉默（以后证明危险地）当作赞同。（~~沉默~~）随后哈贝马斯又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政治观带来的更深一层的道德空虚。正如他在《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危机~~）一书中指出的：政治纯粹视为技术问题，因而相信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样的主张所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性甚至合法性完全建筑于它维持高度技术成功，尤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之上。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一遇经济衰退，这类国家政权就无力唤起公民更广泛更传统的忠诚，结果经济困难会立即危险地激化成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

角度提出这一诊断的,近来一些所谓新右翼的政治学者也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伦理局限性发起了类似的攻击。他们捍卫的是近乎黑格尔式的以珍惜和培植团体精神、忠诚和服从等价值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基础上的保守主义。^①心理学家近年来对实证主义的规范性假设表示了更为强烈的怀疑。如莱恩·罗森博格等人认为,若以规律、因果的眼光看待一切人类行为,一谈到异常行为,首先就会问它们产生于什么机能失常。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忽视下述可能性:这些行为或许具有策略意义,是被用来应付世界的。莱恩认为这个忽略会使有关的人沦为操纵的对象,而他们本来应该被看作有意识的主体。^②

在这种趋向存在主义的心理学背后可以发现萨特的权威。莱恩及其追随者显然受了萨特的影响。不过,在最近思考这个问题的理论家中最有影响的还要首推本书第四篇讨论的米歇尔·福柯。他一九八四年不幸地英年早逝。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福柯一直致力于研究我们社会在历史上处理疯癫、性和犯罪等问题的具体事例,以证明对这些现象的所谓理解正同社会控制的技巧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哲学家,福柯最关心的是找出这种所谓知识同强力机制的使用间的联系。作为伦理学家,他的目的则是敦促我们冲出以科学技术的名义建筑在我们周围的牢笼。他的批判几乎是浪漫主义的。这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中有很长的传统。他反对社会的成规戒律,并呼吁抵制并消灭所谓的人文学科以恢复人性。

① 英国学者对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请见 赫斯特曼 美国的例子见 辛德曼

② 见 福柯 莱恩论萨特见同书页 忽疏注及页 忽疏 远页。

科学本身是否真的就是以理性求知识的范例呢？近年来人们对此的怀疑越来越大。对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种种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怀疑的产物，并从怀疑中汲取了很大的力量。这方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表示的怀疑最有影响。本书第五篇将讨论他的著作。在他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引用科学史中大量的事例来论证波普那种寻找现存假设的反例，只承认通过这一考验的论断为知识的理想在科学界很少得到支持。相反，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在发展中总是试图寻找对现有理论的证实。它们不但不因反例而被抛弃，反而被用来以其权威性排除这些恼人的反例。波普试图对休谟关于理性信念的分析提出质疑，库恩的分析则重新证实了休谟的理论。^①除此之外，库恩还指出，如果想解释我们对某一个科学猜想的接受或抵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既定的习惯，而不仅仅是所谓不带偏见的科学家的理性方法。库恩的思想同福柯有十分有趣的相似之处。就这样地把科学描写成控制甚么可以被允许算作知识的手段。

库恩最基本的论点是：我们对借以检验理论的事实的了解总是透过现有理解的规范（范式和体系）和体系的，因此各科学无法按波普所描述的那种形式发展。更直接了当地说，独立于理论之外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而所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接受的、独一无二的观察、分析、解释世界的方法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当然可以比较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但我们手上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最终他们是根本不可比的。因此，（借用库恩理想主义的比喻）各种不同理论的拥护者可以说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① 波普和库恩的分歧在科学哲学中是一个重要问题。波普很好地阐述了波普同库恩的这一分歧。

库恩对关于科学理性的标准的概念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奎因 对概念和事实间存在着范畴上的区别这一他称为经验主义教条的著名痛击。 它也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论断:我们为理解所谓事实所作的努力与某种生活形式的框架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理查德·罗蒂 的力作《哲学与自然之镜》 中,这些影响汇集到一起,其结果是决心要对哲学和科学在我们的文化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提出质疑。如果我们同现实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有关何谓知识的狭隘观念的制约,那么科学就是不断地发现真实世界这一传统观念就开始显得可疑,至少过于简单化了。此外,如果借此对世界进行分类整理的规范概念体系并不存在,那么认为哲学就是分析这些概念的传统看法也就令人生疑了。① 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被称为对什么可被确知的研究,也因此开始显得不可能了。相反,我们似乎受到认识相对主义的幽灵的威胁。②

对持这一观点的人来说,历史研究越来越成为灵感和例证的丰富源泉。福柯的著作常迫使我们把自己应该如何看待世界的想法与不同历史时期世界是如何真正被看待的记录相比较。库恩也自称是史学家,致力于通过历史记载研究科学界的真实行为,以说明一些现代科学哲学家先验论断的谬误。这些发展部分导致了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 的确地以他们的研究作为同关于人性和理性的幼稚现实主义和与之相联的规范观点斗争的武器。许多科学史学家、伦理和政治哲学史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越来越认为研究奇异的东西的意

① 特别是页 对此的研究见

② 有人说这个幽灵已经出现了,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恐怖。对此进行了谨慎的研究。 的讨论则不那么谨慎。

义,就在于别的时代和别文化可以对某些我们最坚信不疑的假说和信念提出反例。^①

四

我在前言里回顾了上述发展之后,再说这些怀疑主义思想带来了大理论的复归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如果说我前面讨论过的思想家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十分强调局部和偶然的重要性,都想突出我们的观念和态度是由特殊的历史状况形成的,都相应地厌恶——维特根斯坦简直是仇视——所有过份集中的理论和单一的解释模式。这在我讨论的某些学者中——福柯比较含蓄,费耶拉班德则很明确——导致了一种强烈得简直有害于他们自己理论的概念相对主义(费耶拉班德即所谓**相对主义**)^②,似乎要摧毁一切组织经验材料的理论和方法,把这些怀疑论者称为大理论的倡导者听起来好象不着边际。

对这个矛盾我有两点回答。第一,笑话可以说是出在这些怀疑论者自己身上。虽然他们提出了反对理论活动的理由,他们自己当然也在从事理论工作。无可否认,福柯表达了关于知识本质的普遍观点,维特根斯坦对意义和理解进行了抽象描述,费耶拉班德偏好的判断科学假设的方法同波普的方法大同小

① 科学史学家中持此观点最为明显的是无秩序主义者 可以云翥明著员尧特别 是页源-缘为例) 和知识社会学中鼓吹‘强度纲领’的人。后一方法的普遍观点见 月耕译 员尧其应用见 月耕则员尧和 月耕译员尧 在伦理和政治哲学史学家中, 配非则员尧 已被证明是个有影响的模式。更近一些的例子可见 裁聘员尧 特别是页员-源 杂则 员尧员尧 圆和 耕聘员尧 员尧 员尧 员尧 员尧 员尧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最好地论述了类似的事例。请见 员尧 员尧 最后一章和 员尧 员尧 的前言。对我们思想传统更加怀疑的观点见 阅员尧 员尧

② 这一指责，特别是针对福柯的指责，请见 孕雌皂、员愿员-员园-苑猿 阅葬藻藻皂士 员愿原 员圆猿-缘则 声称康德的论点中心有相似的矛盾。

异。甚至德里达在告诉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对解释进行解构的时候也首先肯定了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此外,通过揭示现有信念的不足,这些反理论家对重新引导下一代社会哲学家的研究起了决定性影响。总而言之,给这些反传统观念的人一席之地并不自相矛盾。这些人几乎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当前许多社会科学里最大的理论家。

我的第二个,也是主要的回答是:概述这些“全能破坏者”~~对元理论乃至元解释~~^①的贡献只是我故事的一半。我们下一步要注意的是尽管赖特·米尔斯和他那代人希望将它从人文科学的中心驱除出去,过去二十年里还是出现了毫不掩饰地刻意重建关于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大理论的潮流。

这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中最为显著。具有讽刺意义的那些怀疑论者破坏性的工作给最宏大的理论结构扫除了障碍。要理解这一现象的由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大部分学者对下述看法的强调:概念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永恒的实体,而应该被看作武器(海德格尔语)或工具(维特根斯坦语),对其理解总要包括观察它为谁所用,目的何在,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在最前面提到的传统观念——那伦理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分析伦理的语言或政治的词汇——就不攻自破了。用福柯的话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等着我们进行客观分析的一成不变的概念系统。^②

在分析伦理哲学和分析政治哲学中心由此产生的空白,现在已被这些学科的两个最古老的目标所填补。其一是学者又重

① 这个词是在 ~~赖特·米尔斯~~ 第 源页中专门用来指福柯和库恩的。

② 对这一不同看法及对它的很有价值的讨论见 ~~福柯~~ ~~米尔斯~~ ~~库恩~~ ~~德里达~~